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口上

——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

尚必武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西方理论热的消退，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对学术史的建构与反思渐成风尚。在梳理、反思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浪潮中，陈众议研究员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一书显得尤为突出。该书按照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路径，采用历时和共时的双重视角，史论结合，客观公正地展呈了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画卷。

关键词：《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学术史；未来

作者简介：尚必武，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主要从事叙事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y and Future: A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49-2009*

Abstract: The beginning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witnessed Chinese scholar's passion for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what has been done in the past. As far a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re concerned, Chen Zhongyi's edited collec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49-2009* turns out to be such a highlight. In particular, it has, synchronically as well diachronically, conducted a over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the past six decades. With such salient features of being suggestive and informative, the book will stand as a momentum for China'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49-2009*; review; future

Author: Shang Biwu is Ph. D.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Zhejiang Gong 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Currently, he is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narratology,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biwushang@gmail.com

一、富有意义的研究背景

为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于 2009 年发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

面向全国范围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公开招标。[1] 这是在国家层面上第一次以重大项目的形式招标外国文学学术史项目，其意义非同一般：既是对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视，也是对学术史研究的肯定。众所周知，学术史工程意味着学者们要详占学术史料，继而在卷轶浩繁的文献中梳理学术脉络、凝练学术思想、总结学术建树、反思研究缺失。就此而言，学术史工程的浩大与艰辛可想而知。但是鉴于该工程的重要意义，总有一批学者以“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筚路蓝缕，不畏艰辛，献身此类的学术研究。

实际上，对学术研究的定期回顾与反思已经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行为。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理论热的消退，学者们对学术史的建构与反思渐成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自 2004 年开始就已经着手“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2] 将塞万提斯、歌德、雨果、康拉德、庞德、高尔基、肖洛霍夫、海明威、普希金、茨维塔耶瓦、狄更斯、哈代、菲茨杰拉德、贝娄、左拉、芥川龙之介等 16 位世界文坛的经典作家纳入其中。2009 年 7 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被确立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后出版了论文集《外国文学研究 60 年》（2011），为推动我国外国文学学术史的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近两年来，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社会科学》、《学海》等知名刊物纷纷刊载了关于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的相关批评文章，引发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对六十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审视浪潮中，陈众议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下简称《研究》）一书，显得尤为突出。该书按照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路径，采用历时和共时的双重视角，史论结合，客观公正地展呈了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画卷。

二、丰富厚重的研究内容

回首新中国六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陈众议先生中肯地评价道：“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可谓得失并存，喜忧参半，因此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十分必要”（1）。[3] 在梳理总结我国六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时，《研究》不忘“五四运动”前后，那些为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起到引领和铺垫作用的先驱者们。在第一章“历史回眸”，《研究》以相当的笔墨叙写了“五四运动”前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以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具有社会批判性质的外国文学作品成为译者们的首选，随之涌现出“易卜生热”、“泰戈尔热”、“拜伦热”、“俄罗斯文学热”等。无论是外国文学的翻译队伍还是刊载翻译文学的出版物在这一时期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林纾、伍光建、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沈雁冰、赵元任、张闻天、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都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而《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也都刊

载了相当数量的翻译文学作品。向俄苏学习成为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主旋律。“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不仅表现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上，同时表现在对俄国文学研究上的深化”（28）。继田汉、沈雁冰于1919年分别发表论文《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和《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之后，我国的俄罗斯文学作家作品研究、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俄罗斯文学史研究、俄罗斯文学思潮、中俄文学比较研究都开始发端并日渐繁荣。

1949年，新中国成立。建国以后，“中央对于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对我国的文学事业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87）。《研究》的第二章“最初十年”全面回顾了建国初期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辉煌成就。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超出五四时期。《研究》不仅回顾那个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界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而且有机地回顾了学者们对外国文学研究问题意识研究（如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等）。这一时期，苏俄文学的翻译迎来了一轮浪潮。相比之下，俄苏文学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究其原因，《研究》认为“首先可归结为当时俄罗斯文学作为学科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学术属性和意义尚未被认识”（132）。可喜的是，在苏俄文学的翻译浪潮中，英美文学研究开始起步，莎士比亚、菲尔丁、狄更斯、斯威夫特、萨克雷等作家均被纳入批评视野。除苏俄文学、英美文学外，其他各国文学如德国文学、法国文学、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文学等也都被以译作的前言或后记的方式加以推介。

1960年，中苏公开交恶，极左思潮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肆意蔓延，尤其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外国文学研究开始衰落、停滞。不仅在建国之初盛极一时的俄苏文学研究一落千丈，就连社科院的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也停止出版。但令人欣喜的是，“外国文学并没有销声匿迹，它以非常形式，如手抄、口传等隐秘方式成为一股温暖的潜流”（141）。譬如，在20世纪60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编辑出版了《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等。《研究》的第三章“峥嵘岁月”回顾了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低潮。当时外国文学的“皮书”（“供内部参考”的当代外国文学译作）虽然印数不多，但是看过的读者却数量庞大。对此，《研究》编者感慨地说：“这些书和其他‘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这期间的‘地下流通’速率之高，或许是空间绝后的。一本书常能在短短几年内经过几十甚至上百人转手阅读，对许多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一些年轻人对西方语言文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兴趣，开始了自发的，刻苦的学习和追求。大家失了学，才有了自己的‘学’”（154）。

“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降，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得到空前发展，进入“黄金时代”。《研究》用了全书百分之七十的篇幅来回顾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广泛涉及外国文学作家作品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外国文论研究、外国文学史研究、外国文学思潮研究等多个方面。

就国别、语种和区域文学研究而言，《研究》回顾了英美文学研究、俄苏文学研究、德语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东欧文学研究、意大利文学研究、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北欧文学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朝鲜—韩国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东南亚文学研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文学研究、波斯—阿富汗文学研究、土耳其文学研究、希伯来文学研究、阿拉伯文学研究以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等；就外国重要文艺理论思潮和文论家而言，《研究》重点考察了叙事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比较文学、巴赫金、巴尔特、韦勒克在中国的研究等。

三、研究特色与学术创新

虽然《研究》被纳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以发展报告的形式出版，但纵览全书，不难发现，《研究》不失为一部特色鲜明的学术文集。

其一、作者阵容强大，权威性高。《研究》由我国知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外国文学评论》杂志主编陈众议先生担纲主编，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相关学者就各自最擅长的领域撰写论文，如由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陈建华教授撰写“学习俄苏：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与阐扬”，由中国叙事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文体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知名学者申丹教授撰写“叙事学在中国”，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文学伦理学批评首倡者、《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聂珍钊教授撰写“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等。编者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主编的严格把关，充分保证了《研究》的上乘质量，使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其二、学科意识浓厚，现实意义突出。《研究》不仅是以学术史考辨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解决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研究》对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加以梳理和反思，不仅及时总结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成绩，而且还针砭时下外国文学研究的不足。譬如，在论及当下东欧文学研究匮乏的现状时，编者本着高度的学术责任感指出：“商品时代，文学日益边缘化，加上待遇等种种问题，甘愿献身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由于东欧国家都是些弱小国家，经济上也不发达，从事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更是面临着人们难以想象的困境：机会少，受重视程度低，出版艰难。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这项事业已处于濒危状态。期望国家能高度重视这一严重问题。期望有关部门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扶持东欧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230）。

其三、史论结合，评点精当。《研究》固然是以学术史的梳理考察为基础，但它并不是史料的堆积，而是在对史料做出精细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精当的评点。譬如，针对中国有学者提出要摒弃西方的影响、建构中国自己的叙事学，编者就明确指出：“中国学者近年来一方面有了更强的民族意识和批判意识，努力保持和重构中国文论的特性和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依然注重有选择、有改造

地借鉴西方不断发展的文论。这有利于在保持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借助西方学者的研究来开拓视野，改革创新，发展中国叙事学”（280-281）。至于叙事学在国内的下一步发展，编者又提出了若干中肯的建议：“（1）认识到早期的叙事语法和叙述诗学的局限性。（2）通过跨学科研究来丰富现有理论，以拓展研究范畴，争取新的发展空间。（3）可以结合社会语境的变迁来探讨叙事结构的历史嬗变，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见。（4） 叙事学现有名词术语、范畴概念和分析模式中存在各种混乱和问题，中文和外文之间的不对应也加重了混乱，对此可以加以审视和修正”（282-283）。又如，作为一种新兴的批评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受到学界追捧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对此，编者指出：“迄今为止国内发表的一系列有关伦理学批评的论文中，相当一部分都把‘伦理道德’的讨论虚空化了，往往只注重对作家作品的伦理思想、观点和倾向进行论证和评价，缺乏对文学作品深入细致的客观分析。目前一些所谓的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论文，往往只是属于道德批评的范畴”（325-326）。这些精当的评点有助于后来者避免学术研究的误区，切实解决外国文学研究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从而将外国文学研究事业推向前进。

每到一定时期，人们总会对前一时期的工作做出总结和反思。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世纪之交，我国知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吴元迈先生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发表《回顾与思考——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2000）一文，指陈了新中国五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画上句号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布《外国文学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2010）的国情调研报告，收录了“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英美文学研究小结”、“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三十年工作小结”、“外国文学理论学科 1981-2008 年的工作”、“中北欧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东方文学翻译与研究”、“南欧拉美室文学研究三十年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东欧文学”等文章。诚如陈众议先生所言：“学术史或学科史的梳理与研究不仅是温故知新的需要，同时也是端正学术思想基本方式，而且它最终是为了面向未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为明天的学术发展铺平道路”（6）。《研究》充分践行了这样的理念。我们相信，《研究》一定会为我国未来的外国文学研究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注解【Notes】

1. 最终，经过激烈竞争，北京大学的申丹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陈建华教授分别率领其研究团队同时获得该项目。

2. 该项目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项目。

3. 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陈众议：《当代中国外国文学研究》（1949—200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下文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责任编辑：杨革新